

# 林育南“五变”筹备苏维埃代表大会

1930年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表示要发动群众召开全国性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委任林育南为秘书长，负责相关筹备工作。当时白色恐怖蔓延，林育南不顾个人安危，先后借助五种身份，出色筹备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为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做了充分准备。

## 英租界附近的“归国华侨”

1930年初，上海深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影响，白色恐怖仍然很严重，街上军警林立，特务如麻，党组织的一切活动必须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为了迷惑敌人，开展工作，林育南装扮成归国“华侨富商”，与另一位女共产党员扮成假夫妻，以每月60两白银的高价租赁了一栋位于上海英租界附近的三层洋房，作为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筹备处。

为了避人耳目，林育南特意把房子装饰得相当气派，一楼是“夫妇二人”的住宅，陈设着各种日用品和高档家具，二楼是工作人员专门办公的地方。楼上临街房间的玻璃，都装有墨绿色窗帘，以防街上的敌人看清室内情况。有一天，林育南与“妻子”出去办事，刚从车上下下来就碰到两名便衣特务，他们便若无其事，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特务不但没有怀疑，反而还十分羡慕他们华丽的着装。

## 大戏院背后的“医院院长”

1930年5月中旬，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林

育南已经悄然把上海卡尔登大戏院背后的一栋四层楼房装扮成了私立医院的模样，一层是“挂号”和“门诊”间，二层是“病房”，与会者纷纷成为“病人”进入“医院”。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医院院长”林育南特意通知中央特科专门驻守，并且还在一楼放了大量汽油，后门停放了租借来的小汽车，一旦发生危险，就立即点燃汽油做掩护，方便与会人员迅速撤离。

1930年5月30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医院”正式召开，一楼“门诊间”就是专门开会的地方，当中放着一张颇大的工字型长桌，桌上铺着红布，长桌正前面的墙上，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像，这一切都是林育南精心布置的。

会议期间，由林育南负责安排与会代表们的衣食起居，他们在这栋四层楼房里一起吃饭睡觉，关系就像家人。此外他们还严格遵守林育南之前告知的会议纪律来发言、讲话和走路，特别是吃饭时，大家为了减少凳子的搬动声，纷纷自愿像士兵一样站着吃饭。一周后大会圆满结束，并决定成立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继续筹备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 德馨里的“华校长”

1930年7月中旬，上海玉佛寺槟榔路附近的德馨里来了一位身着长衫、戴黑边眼镜、打扮十分温文儒雅的中年男子，他自称为“华校长”，并精心挑选了一栋隐蔽的楼房，挂出了“德馨小学”的招牌。这位“华校长”其实是林育南，1930年7月初，中共中央委任他

为秘书长，继续负责筹备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

深秋的一个晚上，一群反动军警突然将德馨里包围，并依靠昏暗的灯光，悄悄潜伏进“德馨小学”。这时林育南正在一间屋子里起草文件，他听见声响，立马警觉起来，随即收起文件，熄灭灯，走出房间，从大门缝往外张望，看见了渐渐逼近的反动军警。

情况万分危急，大门已被堵上，而林育南身上又有党的秘密文件，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淡定地回到房间脱掉长衫，换上原来准备好的破衣烂裤，化装成一个乞丐，越墙逃出。在逃脱敌人的包围后，他才得知由于叛徒的出卖，这个据点遭到破坏，万幸的是他机智地躲避了敌人的突然袭击，并且完好无损地保留了党的秘密文件。

## 庆云里的“大家长”

为了继续秘密开展筹备工作，林育南又在上海愚园路庆云里租下了一栋三层石库门房屋，作为新的办公机关。这栋三层房屋是按照一个旧式有钱人家来布置的。一楼是客厅；二楼既是林育南的卧室也是工作人员的工作地；三楼是其他工作人员的卧室。

为迷惑敌人，林育南要求实行“办公机关家庭化”，他是这个“家”的“大家长”，其他工作人员都是“家庭成员”。有一次，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到庆云里搜查，林育南立即让“家庭成员”们装着在一起打麻将，就这样沉着应付过去。上海中共中央代表，比如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恽代英、王稼祥和罗章龙等人都曾来庆云里和林育南商讨工作。

有一天，一个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皮帽的人来到这里，询问有无空房出租，林育南不慌不忙地对答如流，十分完美地将问题搪塞了过

去。只见这人拿下皮帽，扯掉假胡子说：“你的警惕性很高，确实可以瞒过敌人的侦探啊！”林育南这时才发现，站在面前的竟是周恩来。

1930年9月12日，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在上海正式召开。大会考虑到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还未充分完成，以及上海的危险情形，接受了林育南的提议，决定在江西苏区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 前往苏区的“皮货商人”

1930年12月初，杭州车站，一位不显眼的“皮货商人”出了车站，走进一家客栈，订下房间后，立马前往江边购买到浙江衢州的船票。因大雾天气，船不开，他伫立在江边，望着烟雾缭绕的钱塘江，眉头紧缩，无心观赏美景。

这位“皮货商人”是林育南，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顺利结束后，他受中共中央的重托，前往江西苏区，继续筹备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装扮为“皮货商人”，取道杭州，拟经浙江衢州和赣东北苏区，进入江西苏区。

不幸的是，林育南在到达衢州后，蒋介石对江西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通往苏区的所有道路都被封锁，林育南被迫返回上海，这就致使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事宜耽搁下来。

1931年1月17日，林育南同何孟雄、李求实等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在狱中，林育南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对党忠诚，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2月7日，林育南等24位共产党员与革命者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自林育南光荣牺牲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来接替完成。据《文史天地》常思/文

## 慈禧晚年曾力推“书法外交”

对于慈禧太后的书法，相关著述几乎是一致肯定。例如，《慈禧传信录》先是提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需要处理的军中文件很多，由于慈禧太后“书法端腴”，咸丰帝“常命其代笔批答章奏，然胥帝口授，后仅司朱而已”。后又声称作者曾在慈禧太后弟弟桂祥府邸见过很多慈禧及光绪帝的书画作品，认为“后书以四十后为工，庄重凝秀，笔备王欧”，抬出王羲之和欧阳询来类比慈禧四十岁以后的书法用笔，评价已经不能再高了。

那么，慈禧的书法真的能比肩王欧吗？尽管现存一些钤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的书法作品看上去确实功力非凡，但这些作品与原始档案保存的慈禧亲笔书迹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于是，坊间便开始流传，慈禧御笔书法其实是捉刀之作。

实际上，慈禧书法有代笔并不是什么秘密。慈禧晚年比较喜欢的御前女官德龄公主在她的回忆录中，曾提到腊月二十四日慈禧要写一些新年吉祥的祝词：“一大早，我们就陪着太后到了大殿。太监们早已铺设好了大张的黄色、红色、浅绿色的纸张。太后开始泼墨挥毫，写的无非都是些‘福’字、‘寿’字。写了一阵子，太后感到有些疲倦，就吩咐女官或者秉笔太监代为书写。写完之后分发给宾客与宫中大小官员。”这些书法作品虽是别人

代笔，但只要钤上慈禧的印，受赐者当然就视为御笔，觉得无上荣耀。慈禧此举和历代清帝赏赐御笔一样，是一种笼络内外大臣的政治手段。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攻占北京，慈禧和光绪出逃。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1902年，慈禧和光绪帝回到北京。经此一役，慈禧终于放下身段，努力修复与列强的关系。慈禧接见外国公使时，还当着一众外国公使的面，亲自挥笔给每人写了一幅“寿”字作为赏赐礼物。此举在外国人眼里自然很新鲜，对于慈禧能写这么大的字他们很吃惊，他们也知道这是太后表示格外礼遇的一种方式。通过现场书法表演，端居帝国权力顶端的太后走下云端，以一种看起来极为亲切的行为，在外国公使的眼里增加了个人魅力。

英国人萨金特在他的《慈禧太后》一书里提到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华西方记者和普通人都极为仇恨慈禧太后，但在慈禧生命的最后几年以及去世后的两年内，西方人却改变了看法，“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在1902年至1908年的六年当中，慈禧太后不遗余力地挽回了曾经的消极影响，同时还成功将自己转化为颇具维新色彩的人物，从而赢得了很多西方人的好感”。

据《书屋》李鹏/文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

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风采

## 勤劳人 吉祥人



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陕西卢基 王乃泉作